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34161411



当代学术镜鉴译丛·全球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Toby Miller George Yúdice
Cultural Policy

文化政策

[澳] 托比·米勒 [美] 乔治·尤迪思 著 刘永孜 付德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文化政策

[澳] 托比·米勒 [美] 乔治·尤迪思 著 刘永孜 付德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政策 / (澳) 托比·米勒, (美) 乔治·尤迪思
著; 刘永孜, 付德根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Cultural Policy

ISBN 978-7-305-16288-6

I. ①文… II. ①托… ②乔… ③刘… ④付… III.
①文化产业—产业政策—研究 IV. ①G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015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Toby Miller & George Yúdice,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6-24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从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文化政策

著 者 [澳]托比·米勒 [美]乔治·尤迪思

译 者 刘永孜 付德根

责任编辑 张建成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06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288-6

定 价 5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Toby Miller George Yúdice

Cultural Policy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1 / 导言:文化政策的历史及理论

3 / 西方治理性的兴起

8 / 趣味的哲学化

15 / 塑造和管理伦理不完善的主体

19 / 资助的借口

26 / 国家和超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国家计划

30 / 后国家世界中的公民权和文化

36 / 文化政策研究

43 / 结论

45 / 第一章 美国、文化政策和国家艺术基金会

50 / 文化外交政策的出现

61 / “福特主义”孕育国家艺术基金会

66 / 性与种族

72 / 文化管理

76 / 政党政治和宪法

81 / 来自左派的批评和社群的观念

88 / 结论

95 / 第二章 文化工业——公民、消费者和劳动力

96 / 公民/消费者/工人?

102/ 迈阿密的音乐和娱乐

110/ 澳大利亚——混合的文化经济

120/ 电影工业和英国政府

130/ 拉丁银幕领域

140/ 结论

143/ 第三章 指令性文化和后殖民

145/ 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

154/ 法西斯文化政策

158/ 拉丁美洲

186/ 后殖民

195/ 第四章 博物馆

197/ 历史

206/ 论战

214/ 弗里曼特监狱博物馆

220/ 第五章 跨国文化政策

2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28/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

234/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南方共同市场

240/ 欧盟

244/ 结论

246/ 结论

256/ 参考文献

295/ 索引

导言：文化政策的历史及理论

1

对普通人施行教育才是保护个人和财产的最有效方法，
谁能否认呢？

——麦考利爵士(Lord Macaulay)

[引自 Lloyd and Thomas (1998) 18]

文化和政策在两个领域中相关联：美学和人类学。在美学领域中，艺术作品来自创造者，并以美学标准加以判断，美学标准则通过文化批评和历史兴趣及实践来建构。在这一世界中，文化作为标志，体现社会群体中品位和地位的差异性及其相似性。另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中，文化是我们如何生活的标记，是地方与群体的意义——这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基于语言、宗教、习俗、时间和空间。所以，美学表明族群内部的差异（比如，哪个阶级拥有文化资本来欣赏高级文化，哪个阶级没有），而人类学说明族群之间的差异（比如，哪个国家销售新技术，哪个国家没有）(Wallerstein)。

文化政策是指用以沟通美学创造与集体生活方式的制度性支持——美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之间的桥梁。文化政策体现为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行动指南，为各种组织所采纳以达成组织目标。简单地讲，文化政策是官僚的，而非创造性的或有机的：组织通过执行政策来征招、培训、分配、资助、描述和拒绝那些打着艺术家或艺术作品旗号的人与

活动。政府、工会、大学、社会运动、社群团体、基金会和企业为创造者提供补助、基金,并控制、推动、教育和评估他们;事实上,这些组织往往在决定一套标准,来实现“创造性”一词的可能含义。人们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执行这个标准:以它们是艺术作品为由,法庭裁决允许其中含有某些色情成分;以它们具有提升道德的功用为由,在课程中要求学生阅读剧本;以它们反映了民族问题为由,电影委员会为某些剧本提供资助;以创新为由,企业在非演出季印制交响乐演出节目单;或者以需要对中产阶级(大部分是白人)的文化补充一些“多元性”为由,基金会赞助少数民族群的社区文化。而这些标准本身可能分别源于法律原则、公民教育、旅游目标、制作人的利润计划或慈善的愿望。

对文化的第二个理解出现在学术性的人类学研究和对时代精神进行阐释的新闻报道中。比如,在土地所有权法庭(land-rights tribunals)出现以前,人类学家所指的本土文化部分地是由国家依据当地的政治问题和国际人权话语所采纳的行为规则来决定的。相似的是,报纸特写对雅皮网络文化的描述,部分地取决于报纸编辑/经营者根据当地市场细分和国际职业规范所采纳的行为准则。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策,我们才听说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仪式活动。

除了这些高度审慎的政策实践之外,有些政策是临时性的,用以渗透社会空间,调动“某一类公众组织”,来达成维持或修改意识形态系统的特定目的(Vološinov 96-97)。这类政策的特点是操演性而非描述性,它们往往是为了应对突发的压力,因而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用符号学术语来讲,文化与政策二者都有自己的语言(langue)(正式的、由规则驱动的本质)和言语表达(实际应用)。正如言语使语言复杂化一样,在文化政策中,美学与人类学领域必然会有重合。

在1982年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即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办的一次关于文化政策的国际会议上,与会代表达成共识:

文化赋予人类反省自己的能力。正是通过文化,人类可

以表达自己，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质疑自己的成就，不知疲倦地找寻新的意义，并创造出借以超越自身局限的新作品。（‘The Mexico City’ 190）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委员会虽然是以第一世界国家的身份在工作，却被其南方庞大邻国不公平的文化输出所激怒，因而要求一种“合理的文化教育”，借此保证公民参与自我批评和自我欣赏，目的是为了创造全面发展的个体——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实现维持与更新相结合（Canadian 81）。

这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以上的原则是否界定了文化政策的领域呢？为了历史化和理论化地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绪论中通过七个方面来研究文化政策：治理性、趣味、伦理不完善、资助的借口、国家和跨国计划、文化公民身份、文化政策研究。这是我们深入本书核心的序曲：那些决定着学科构成和管理的文化知识以及实践。同时，作为一本试图概括当前国际视野中有关文化政策研究进展情况的著作，还要介入和干预某些竭力推行特定的理论及政治倾向的见解。我们将自己置于文化研究的严肃规范，而不是声称客观的正统政策研究中。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社会运动作为权力、授权和责任的基点来阐明知识。较为传统的研究是结合社会再生产，以政府作为权力、授权和责任的基点来阐明知识。我们的研究关注如何转变社会秩序，其他的研究则试图复制社会秩序——这是作为变革领域的文化政策和作为功能领域的文化政策之间的较量。因此，我们的立足点是理论、历史和政治，而不是效率、效力和描述。

3

西方治理性的兴起

无论是在历史上抑或是在今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关于治理性的概念一直是西方国家在文化领域中所持主张和行为的关键内容。福柯用这个词来解释“现代国家开始担心个体的方式”。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即是一例,即使是在着手建立屠杀政权的时候,促进公共健康的运动也在一同进行。这种自相矛盾是持续的、虚伪的“生死游戏”,通过这个游戏,国家把自己建构为仁慈的专制暴君(‘Conversation’ 4)。福柯使用了“野蛮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新词汇:治理性”,以一种讽刺的方式,为这个新兴的现代主权国家提供了一段历史。治理性一词最初是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创造出来的,用以描述市场价格波动和政府的应对(130)。

福柯指出,在欧洲不同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中,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五个贯穿整个16世纪的问题:“如何管理自己;如何接受管理;如何管理他人;由谁来管理,人民才会接受被管理;如何成为可能的最佳的管理者。”这些问题是在两段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主权国家取代封建国家,以及同样是冲突不断的宗教改革。日常经济和精神上的政府被提出来重新定义。国家开始以一种集权化的趋势来谋求自己及他人的正常化。纠缠于教会纷争的宗教权威因而失去了赐予君主政权神授权利的合法地位。君主逐渐转化成为一名经营者,而不再是天生的统治的化身(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87-90)。

从此,政府治理就需要一种双重作用。君主发现了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并根据获得的这些教训来处理他的领地。父亲学着像管理公国那样经营他的家庭,并训练他的孩子将顺从和勤奋带入社会领域。这样,家庭的生活方式就影响到家庭以外的行为。这种来回往复的公共与私人间的相互运动,强制的和内化的规范穿梭往返于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寻求公民的和睦/控制,并成为人们所知的“治安(police)”。教育学从统治者的自知推断出对他人的规则,对治安的维持将这种运动传输给一家之主,也将之延伸到街头巷尾(91-92)。换个方式讲,我们也可将之视为政府的经济化,是自身和社会之间寻求效率、权力的一种复杂运动。

伴随着 17 世纪的剧变，如“三十年战争”和城乡骚乱，新型的社会组织出现了。在 18 世纪的欧洲，“经济”这个概念广为传播。“经济”曾经是管理上的发明，用于塑造正确的行为，如今转变为一种对社会领域的描述。直到现在，领土的管理仍次于事物的管理和它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管理。人们根据气候、疾病、工业、财政、习俗和灾难——确切地说是生命与死亡的关注，对它们之间可以计划和管理的事物的关注——来构想和建立政府。财富与健康成为社会目标，人们通过在整个人口中进行能力配置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生物权力”的作用，“生物的存在反映在政治的存在中”。生物权力“将生命及其机能带入可以明晰计算的领域，并使知识权力成为改变人类生活的媒介”。身体与政治融为一体，因为对身体的管理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与当代生活依旧紧密相关。对福柯而言，“当所有人将生命都押注于社会自身的政治策略，一个社会就抵达了‘现代性的门槛’”（‘Governmentality’ 97, 92 - 95 and *History* 143）。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可追溯到这一时期，而且通常都与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的推崇相关联。但是，正如迈克尔·J. 夏皮罗（Michael J. Shapiro）对亚当·斯密的研究所表明的，这一话语的奠基者斯密将主权理论化，使之超出了对忠诚的表现和维护——政府也被要求管理“社会领域中的各种交易行为”（*Reading ‘Adam Smith’* 11）。重农主义者和斯密都确认了政府地位的转变，从以合法性为基础转向以技术为基础，尤其是区分“什么是自由的，什么必须是自由的，以及什么是需要管制的”之能力，在犯罪和健康领域尤其如此（Foucault ‘Problematics’ 124 - 25）。以公民管理和经济生产力为标志，科学与政府在新的环境和法律关系中结合起来。自 1853 年起，英国国会要求对所有儿童注射天花疫苗，同时这也是在医药和身体政治领域中进行公共管理的里程碑。两年后，阿吉尔·基拉德（Achille Guillard）把“政治算术”与“政治和自然观察”结合起来，发明了人口统计学，这是自 17 世纪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后兴盛发展而来的方法。这门新知识整理

- 5 统合了五方面的内容：生殖、老龄化、移民、公共卫生和生态学(Synnott 26; Fogel 312-13)。文化政策也成为这种关怀义务的组成部分。比如说，在 20 世纪交替时期，英国政府推出了“全民教育”的政策。随后，1902 年颁布的教育法案规定小学课程中必须包括参观博物馆的内容(Coombes 124)。

关键的变化是由国王积累自身权力，转而从技能的形成把权力分散到全民中。中央投资于民众，使他们具有生产和消费的能力，在生活的某些区隔中给予其自由，而在其他区隔中要求其服从(Foucault ‘Problematics’ 125)。政府希望人们通过最为合理地分配可利用的资源来制造产品。因而，治理性是随俗的和工具性的，它的目标是全体民众。与此同时，慈善事业也在欧洲发展起来——这便是今天介于私人 and 公共之间的第三部门的由来。它既不是营利的也不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这个部门由那些热心社会改革的精英所占据，第三部门的运营超越了政治的利己主义规范，但仍采用治理模式(Donzelot 36, 55-57, 65)。

在一个国际化的、后重商主义的世界里，家庭模式作为一种经济矩阵仅仅是地方化的，但它曾一直延续到整个 19 世纪上半期，直到国家的外化创造出了新的工业和生产模式。这种新的二元性——帝国和经济——扩展了政府的范围，使之超越了君主和家庭。人口已经取代王子成为累积权力的基石，国民经济则取代家庭成为社会干预和获取国内外成就的基础(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98-99)。

显然，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与主权国家的兴起相联系，主权国家关心如何为商业输送驯服和健康的劳动力，但又不只如此。在现代，管理公共卫生和治理霍乱、卖淫成为政府该做的事情，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全民的健康是政治权力的基本目标之一”。整个“社会机体”应因其机能不全而得到诊治。最为重要的是，治理民众意味着服从“健康需求：它即刻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所有人的目标”(Foucault ‘Politics’ 277)。这种健康观念先后扩展到教育和文化中。

当然，在治理性出现之前，文化政策早已是一个象征性和高度实用

性的话题。1400年之后,英语被推举为英国国语,拉丁文和法文书写不再得到承认。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为了增强自身的合法性,鼓励议会和公民的民族团结,在推动这种语言政策上发挥了作用。在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当政初期,她的官员们就将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定为征服和管理的语言。皇家文法学家安东尼奥·德·奈布瑞(Antonio de Nebrija)在其著作《卡斯蒂利亚语文法》中写道,“语言就是帝国”,这本书出版于1492年这一重要年份(11)。到了15世纪中期,意大利贵族建立起图书馆,并雇用抄写员。这标志着生产权力符号的工业进程已经到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文化政策奋力鼓动的巨大双翼:资助和培训。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王室画廊发展为装饰奢华的场所,其目的在于通过装饰风格和悬挂统治者的肖像,让本地和国外的参观者对政权留下高贵庄严的印象(Duncan *Civilizing* 22)。在18世纪90年代,罗伯斯皮尔时期的法国政策,用阿贝·格瑞戈尔(Abbé Grégoire)的话来说就是“消灭方言,独尊法语”(引自‘How Multilingual?’)。在1850年,20%的法国公民不会说法语,因而以印刷业和义务教育的方式来矫正这一缺陷。同时,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初期,拉丁美洲政治家们确信,与以拉丁语为基础的西班牙语和欧洲文法不同,根据人们经验观察而设计出的新世界西班牙语的语法,将能够维持民族团结(Bello ‘Prologue: Grammar’ 101–102)。1870年,意大利再次统一,此时马西莫·德·阿齐格里奥(Massimo d’Azeglio)在发起语言政策时解释说,“我们已经建立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引自Shore ‘Transcending’ 474)。

一旦语言得到分享,其他形式的文化生产也将紧随其规范——语言的变化与地理管辖相应。帝国的文化政策各有不同,包括语言排斥(英国和荷兰在他们的殖民地的态度)、语言同化(弗朗哥当政时期的西班牙、今天的加拿大、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基斯坦)、各种语言享有同等的合法地位(当代的加拿大、秘鲁、巴拉圭、尼日利亚和奥地利)(Schmidt 57–63)。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今

天,如巴斯克国家(Basque Country)和加泰罗尼亚这些新的(次)国家实体就力图使其民族语言标准化,并将此作为自治政府的首要任务(John H. Fisher, 1168, 1170, 1178; Phillipson 8; Urla 822; Bolton and Hutton; Nathaniel Berman)。克罗地亚的文化政策更是去除了可能“污染”新的国家语言的任何塞尔维亚语的残余。苏联解体,各个前加盟共和国在处理国家中众多讲俄语的少数民族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将俄罗斯语边缘化,并为公民设立宗教、种族和语言的标准(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要么采用根据版图、忠诚度和劳动力来授权的公民政策(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就是如此)(Laitin 314-17)。现在爱沙尼亚政府必须解决人数众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问题,因为最初采取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孤立了俄罗斯少数民族,政府现在只有通过建立俄语学校和文化团体来缓和民族矛盾。

这些语言管理方法是寻求对民众进行教育,使之形成趣味。或者说,趣味的形成就是文化治理或文化政策。要介入这种转变的哲学关联,我们将求助于西方的趣味论(cosmology of taste),它是与现代西方政府同时出现的。

趣味的哲学化

18世纪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认为,趣味是“没有法律约束的守法(conformity to law without the law)”⁽⁸⁶⁾。他是指,如果在教育的恰当监督下[“在文化进程中,维持文化长期受尊重的例子”(139)],审美活动会产生一种效果和一种关于人类课题的“知识”,它来自普遍有效的“道德的实践规律”,这些规律独立于私人的利益之外。它们“是基于超感性之上的,自由概念借助形式规律才使之成为可知”(Kant 11)。按照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相当于一场新的“哥白尼

革命”，它解释了知识的创立“不再基于神学原则，反而是神学拥有了最终的人类的基础”(Deleuze 69)。对康德而言，这种具有普世特点的基础就是公共领域，其社会性(the social)置于布尔乔亚的现代性中：“趣味作为一种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或“公众意识(*public sense*)，也就是一种批判能力，这种判断能力在人自省时(先验地)考虑到其他人的表现方式……用全人类集体的理性来评判自己的判断力”(Kant 151)。

经济现代性穿越了一两个世纪，其间一些更具革命性的思想家将其重要性归结为集体忠诚。卡尔·马克思写道：“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道德力量。”必须用“组织法(*organic laws*)来补充宪法”，比如文化政策(*Eighteenth* 27, 35)。这些组织法及其文本的发展表现着“时代本身的思想意识”(Althusser 108)。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这一补充理论化，称其为宪法(“政治社会”或一种“用以控制大众使之遵照既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器”)与组织法(“市民社会”或“一个社会团体通过所谓的私人组织，如教堂、工会、学校等，对整个国家实施的霸权”)之间的“均衡”(204)。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应用于文化，将其定义为主流文化与剩余文化、新兴文化之间的争夺。当主流文化利用教育、哲学、宗教、广告和艺术，使其主导地位在组成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团体间看似合乎自然和规范时，领导权就是牢固的。达成“共识”就例证了一个“道德国家(*ethical state*)”的出现，“道德国家”应该获得普遍的忠诚并超越阶级的认同(Lloyd and Thomas 114 - 18)。为了使趣味和权力的变化合法化，这些活动必然要提及和参考历史的变化。剩余文化包括旧的意义和实践，它们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依旧影响甚大。新兴文化要么由一个新阶级传播，要么被主流文化吸纳，成为领导权的组成部分。这些都可以在威廉斯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一词中找到说明：一个时代的无形资产解释或发展了生活的品质。这些指标常常陷于官方文化与实践意识的抗争中，或至少存在

不和谐。另外,威廉斯强调社区生活、任何文化构成中存在的冲突、文化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的文化性质的重要性。

葛兰西在他的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研究中使用了民众(the popular)的概念,将之作为推动意大利政治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他的判断,当时进步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与主要的社会力量,尤其是与“广大民众(popular masses)不相往来”。他认为有必要建立起服从于革命的“民族-民众(national-popular)”意识或“集体意志”。作为建构领导权计划所必需的“集体取得单一文化‘思潮’”的手段,语言是最重要的。对他而言,语言如能适合大众阶层(包括艺术和电影语言),或许就是获得领导权的最具战略性的手段,它必须直达那些可以带来革命性改变的底层人民。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当他们“参与到一种特殊的世界观的建构中……就会为支持和修正这种世界观做出贡献,也就是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Gramsci 348-349, 97)。体制中的和党派内的知识分子则将常识转变为良知(good sense),并以此指导民众——这就是文化政策在产生作用。

那么,国家的文化政策就是领导权的特权领域。文化政策坚持国家是超越特殊利益的实体,为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身份提供了一种方法。为了与处于领导权核心的已协商的冲突(negotiated conflict)保持一致,文化领域制造出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因历史偶然性而造成争议的领域。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和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以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为例,他们拒绝了针对公民权和政治代议(比如教育)的文化标准,理由是在“被代表、被教育和被分配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61)。其他的例子是关于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布尔乔亚之间的竞争,以及(较新近的)主体位置:移民、反殖民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性别和种族。同化这些人类学差异的尝试往往是将差异置于美学的统一标识之下——因此,一方面是语言政策与教学的紧密联结,另一方面是文学与视听媒体间的密切关系。